

拜年花樣

年三十大清早出門買報紙，街上一片悄然無聲的靜謐。維港的海水微波不揚，的士站十幾輛的士靠路邊排着隊候客，十字路口紅綠燈寂寞地轉換着顏色。

上午八、九時，我再度出門辦事購物，到銀行、到菜市場，方知凡事不能僅看表象。到了熱鬧的蕪湖街，先後進入幾間菜舖，人頭湧湧，滿是主婦、長者，也有年紀輕輕的家傭姐姐，他們在搶什麼呢？原來是在猛掃豬肉和一隻隻冰鮮雞，幾乎已被一掃而空了。再拐彎到一條橫巷，也是如此，連平時肉質酥軟、價格比較高因而較少人問津的西施骨也購者眾，所剩無幾。忽然頓悟，這市井的興旺景象，真與前幾年的農曆新年大除夕大不同。

往昔，菜市場沒那麼熱鬧，生意一半讓酒樓食肆「分擔」了。那時沒有新冠病毒，團年飯預訂爆棚，大小小酒樓生意紅火，酒樓老闆賺得眉開眼笑；而二〇二一年辛丑年不但疫情未了，香港在疫情的驚濤駭浪中如一隻小舟，顛簸起伏，酒樓食肆餐廳堂食的「限聚令」依舊，這意味着大家庭的團圓飯成了鏡裏花水中月，也難怪家家酒樓、快餐店或超市的新春盆菜或新年外賣套餐宣傳單張印製得五顏六色、令人垂涎。由於疫情，大部分家庭不能上酒樓餐敘團圓，退而求其次，只好自己買菜餸、大顯廚藝。菜市場的雞鴨牛豬如何不被橫掃一空呢？

這樣一想，辛丑年春節過年，真是虧了酒樓。接連到初二初三，因為盡量不團拜，街上也顯得冷清，今非昔比；初三夜晚未到九點，以前住宅人口密度大、頗為熱鬧的



人生在線

東 瑞

黃埔花園，多個商場內的餐館早就渺無人影了，我們探望小女回家路過，探身看看，平時歡聲笑語的商場水盡鵝飛，多間食肆已經拉下鐵閘。疫情下的新年，果然遜色很多。所幸，隨着近日日本疫情稍緩，年初七開始食肆放寬至四人一枱，晚市也重開堂食，希望飲食業在防疫同時，能多做一點生意，多點進賬吧。

傳統的拜年，相信很多人都跟我們一樣，取消了長者之間的互拜，避免潛在的病毒感染。因為我們上下兩代三個小家庭住得近，互訪小坐，還是蠻歡喜，雖然少了出遊話題的談興，惟有年幼的孩子純真，吃糖果朱古力、照樣嬉戲個不停。

拜年，在病毒依然肆虐的新形勢改變了不少形式，可謂各出奇謀，花樣不少。像印尼的華文作家組織，就在初三舉辦了一個百餘人的視頻團拜，跨城市還跨國境，事先錄影賀年的有之，現場拜年說話的有之，非常熱鬧；微信群組的賀年、拜年也因此比往年更熱鬧，從大除夕晚就開始互傳。色彩斑斕、款式奇特燦爛。錄影真人、有聲有色的有之；圖文並茂、組織有序的有之……病毒無法阻擋聰明人類的親友情聯繫，疫情未了，人情依舊濃。

如果從最初爆發的二〇一九年底開始計算，疫症已橫跨第三年；特殊的年關，特殊的過法，隨着疫苗的開發、接種，相信戰疫的成功為期不遠，在辛丑年能看到第一道曙光從地平線上升起，讓我們伸開雙手歡迎它吧。



如是我見

黃秀蓮

港鐵車廂裏，小夫妻緊緊依偎，坐在一角，懷裏抱着新生嬰兒。疫情下市民盡量減少外出，攜帶幼嬰出行的更少，我禁不住留神望去。

襪襪是個昭君套，帽子連着衣服，下擺有一排鈕扣，恰像封套把嬰兒裹着。昭君套滾了粉紅色緞邊，印上粉紅碎花，那麼年輕夫妻懷裏的是掌上明珠了。嬰兒不便戴口罩，唯有在昭君套內再加一頂帽，帽子前端垂下透明膠造的面罩。面罩猶如屏障，多少也可以擋一擋新冠肺炎的病菌，然而透明膠的硬度使面罩



人與事

胡葆琳

我第一次聽到黃埔軍校的校名是在一九七五年三月裏的某一天。當時，有二百九十三名特殊身份的老人住在北京前門飯店。幾日來，除少數家屬前來認親外，還有一位訪客，他的出現引起了新華社記者的關注。

「杜老是來探望黃維和胡靖安的」，陪同幹部向記者介紹。杜老一眼見到幾十年未見的老同學時，立即快步上前一一握手，鎂光燈閃個不停。

當天下午，我和妹妹再次來到前門飯店。「今天，杜伯伯來看我和黃伯伯了。」「爸，杜伯伯是誰？」妹妹問。

「杜伯伯是杜聿明，黃伯伯是黃維，我們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的，杜伯伯和黃伯伯是黃埔一期，我是二期，比他們晚了三個月入校。」這是我第一次從父親的口中聽到黃埔軍校，第一次知道父親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二期。

一九七七年一月，父親病重住院，我和哥哥請長假陪護。一天，鄰床的病人突然大口噴血，狀態甚為恐怖。我怕父親受刺激，勸他轉過身去，他不肯，我只好去借輪椅，推着他去院子裏曬太陽。

父親埋怨我大驚小怪，氣呼呼地說：「這有什麼可怕的，打仗的時候什麼沒見過！我當年軍校沒畢業就參加東征經常是早上幾十個同學一起出發，回來時只剩下不到一半，看着空蕩蕩的營房，我很難過，但是不害怕，因為黃埔學生都做好了赴死的準備。」他頓了頓，接着說：「戰鬥結束後，我們立刻去戰場尋找陣亡同學的遺體，然後抬回軍校埋葬，我如果戰死，活着的同學也會找到我，將我和他們埋在一起。」

父親視死如歸的態度，令我很是吃驚。有一天，父親說起淞滬大戰。「當時，我們侍從室一行數百人赴蘇州督戰，沒想到日軍第二天一大早就來轟炸。我被飛機的轟鳴聲驚醒，只見無數炸彈從天而降，附近的幾座小樓頃刻間被炸毀，黑煙滾滾……」

「趕快把日本飛機打下來呀！」我怒不可遏。父親嘆了口氣，搖頭道：「唉，蘇州沒有防空設施。那次轟炸，我們死傷一百餘人，其中有許多黃埔同學。面對一具具殘缺不全、血肉模糊的遺體，我的心中充滿仇恨。我是幸存者，活着就繼續戰鬥。」他望向遠方，神情凝重，目光堅定。

我默默地看着他，任由他的思緒飛回淞滬戰場。淞滬會戰驚天地泣鬼神，一場場屍山血

也許是前期心理建設之充足，我在觀影過程並未如此前觀眾反饋那般：淚濕一包紙巾或一個口罩，而是能夠與角色保持一定距離、以更為客觀的視角去解讀。簡要來說，觀眾之所以覺得電影「好哭」或使人動容，大多出於賈玲在其中的本色出演，她的哭戲，與其說是「戲」，不如說是真情流露或個人情緒淋漓盡致的釋放。這樣的釋放，無關乎技巧，卻是藝術創作的原動力，也是最能打動觀眾、引起共鳴的「感染力」之所在。

「發乎情」對於文藝創作確實重要，但就作品而論，只有「情」是否足矣？以這部電影為例，觀眾如果不事先了解劇情或被「劇透」，未必能輕易看懂電影的高潮部分。當劇中重要資訊、元素無法清晰、有效傳達，創作者想要傳遞給觀眾的感動就會大打折扣。

故事的高潮應在女兒賈曉玲意識到重傷

疫情裏窺看小生命

不能貼面，那做爸爸的對保護裝備很不放心似的，時不時把面罩壓一壓，只希望更貼面，可是沒一會兒面罩又回復原來狀態，與嬰兒粉紅色的臉維持距離，這一兩寸的距離叫人多不放心啊。嬰兒淺淺入睡，忽而睜開清亮的大眼睛，輕輕呵欠，再尋夢去。一串小動作無限趣致，又帶幾分嬌柔，看得父母甜甜的。

那父親穿了束腳褲，褲腳抽高，露出紋身的小腿。那媽媽發胖的身軀說明了生育不久，仍未收身，已經歷了產兒的痛楚，而跨過了女性的里程碑。平平凡凡的小夫妻，因嬰兒在疫情中來臨而面對挑戰，抗疫角色顯得更積極，一下子擔當了勇者的任務，不止保護自己，還

要保護抵抗力弱的嬰兒。

車到了北角站，許多乘客在此轉車。那媽媽把嬰兒接過來，男的伸手護着妻子，女的抱緊嬰兒，還用手把面罩輕按，一家三口離開車廂。既然心有所憂，因何還要外去？可能到母嬰健康院檢查吧，可能祖輩盼望一睹愛孫稚嫩如抽芽的容顏吧，塵世裏總有萬千理由，結果讓我這陌生人無意之中窺看了小生命。

在疫情中彼此依靠，互相扶持，好一幅防疫圖。點滴回憶，浮生掠影，真該拍攝下來，且看看這定鏡這特寫：溫馨中流露堅強，謹慎裏透出擔憂，愁悶中沁出喜悅。車廂一景，小中見大，亦足印證香港抗疫的經過。

我的父親胡靖安將軍（上）——黃埔精神 薪火相傳



◀胡靖安（左起）、黃維、杜聿明三位將軍合照。

作者供圖

海的犧牲，讓中華民族形成了抗戰到底的共識。

上海的春天陰雨綿綿，好不容易等到天氣放晴，我連忙攙扶父親坐到輪椅上，然後推着他去院子。這一天，他講起台兒莊大戰。「當時，日軍以優勢兵力大舉進攻台兒莊，我台兒莊守軍拚死死守，為外線部隊完成再包圍爭取了時間，然後將敵人包了餃子。」「包餃子？」我忍不住提問。「就是日軍圍攻台兒莊久攻不下時我們從外面將他們團團圍住，然後裏外夾攻。」父親解釋一番後，面露喜色地告訴我：「那一仗，我們一舉殲滅日軍二萬餘人，繳獲大批武器和彈藥。」

「太好了！」我聽聞中國軍隊打了勝仗非常高興，心想，父親一定參戰了，便問：「爸，你有去台兒莊督戰嗎？」「有，我曾經三次進入台兒莊傳達密令。」

「哎喲！你參加東征時負責傳令班，怎麼十幾年以後還是傳令？」我有些納悶。

「呵呵……」父親忍不住笑了笑，解釋道：「我去台兒莊傳達的命令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機密作戰命令。」

「可是，為什麼要派你去？」「因為負責死守台兒莊城的師長池峰城也是黃埔的，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受訓時，我是副團長，他知道我的身份。」

「什麼身份？」我很好奇地問。「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參謀，為防止日軍通過無線電偵聽和破譯電報密碼得知我們的行動計劃，委員長下達的作戰命令只能口諭。」

「口諭是什麼？」「就是口頭傳達。」父親不厭其煩地回答了我的一連串發問後，開始講述那段令他刻骨銘心的經歷：「我第一次進去時戰鬥尚未打響，我傳達完口諭後即去觀察工事構築和機槍掩體，不料剛一探頭就被打了冷槍，子彈擦耳而過，好險！第二次，是在一場白刃戰後，我冒險穿過激戰後的戰場，看到許多戰士是與敵人扭在一起同歸於盡的，禁不住熱血翻滾。」父親說到此，視線放遠，停頓片刻後微微激動道：

「我回去向委員長報告，我們有這麼好的士兵，中國不會亡！」

父親第三次冒死傳令，是在日軍已經佔領了台兒莊城的三分之二，情勢萬分危急之時。父親回憶道：「我好不容易找到守軍向池峰城傳達口諭，務必不惜一切代價再堅守二十四小時。他面色沉重地告訴我，這些天，日軍每天天一亮就出動大量坦克和重炮發起猛烈攻擊，我師傷亡嚴重，現在只餘四百兄弟死守。面對這些明知自己第二天即將犧牲卻毫無懼色，已然決然與陣地共存亡的將士們，我肅然起敬。士兵們得知我是上峰派來的特使，援軍很快就會趕到的消息後，士氣大振。我和池峰城反覆研究後決定組織敢死隊。」

父親越說越激動：「當晚，一支撕去左袖，左臂紮一條白布條的先鋒敢死隊摸黑殺入敵營，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狠狠砍殺熟睡中的敵人。日軍做夢也沒想到，經過連續猛攻已經死傷大半的中國軍隊還會乘夜出擊，以至猝不及防。在隨之展開的白刃戰中，許多戰士在死拚中犧牲，有的在敵群中猛然拉響手雷以身殉國。」

台兒莊守軍以生命換時間，用生命拖住敵人的英雄氣概震撼了我的心靈，我小聲問：「敢死隊員有活下來的嗎？」

「有，去了五十七人，回來不到二十人。」父親沉默片刻，接着說：「敵人受到重創後，第二天沒有發起攻擊，而我軍各部已經成功合圍，並立即發起總攻。」

台兒莊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，鼓舞了中華民族抗戰到底的勇氣和決心。

父親冒着生命危險三進三出台兒莊，出色完成任務，同年年底晉升陸軍中將。之後，又繼續奔赴各戰區督戰，一次次臨危受命，一次次不計生死，不負使命。我在父親身上看到一種甘願為國家和民族獻身的信念，很多年以後才明白，這種信念正是黃埔精神。就這樣，父親在回憶親身經歷的同時，將黃埔精神的種子播在了我的心裏。

正月十二 搭建燈棚



春節習俗

正月十二，搭建燈棚。元宵節將近，開始做元宵賞燈的準備工作。

圖：馮印澄
文：新華社



藝術創作中的理解與成全

辛丑牛年伊始，內地趕在新春檔期上映的電影中，一部《你好，李煥英》賺足了票房和口碑。這部電影是喜劇演員賈玲執導的處女作，改編自二〇一六年出品的同名小品。故事取材自賈玲的個人經歷，是其為紀念已故母親李煥英所作，因而她一併承擔起編劇、導演、主演等重要角色。故事講述作為女兒的賈曉玲，因母親意外重傷而過度悲傷，穿越回二十年前、與少女時代的母親相遇。

在觀影之前，我已從多種渠道獲悉與該片相關的資訊，如：賺足觀眾眼淚的是賈玲的「真誠」，賈玲憑藉此片成為中國票房第一的女導演，等等。「有故事」的人，通過不同途徑「轉化」親身經歷、寄寓個人情懷，由此昇華成某種創造，如藝術作品，是值得尊重和敬佩的。因此，我本人對這樣的作品往往抱有寬容的心態，更能以同理之心去觀察、了解和反思。



自由談 嚴詩詰